

王国维对康德的误读

朱生坚

对于唯理论，王国维“觉其可爱”，甚至于“酷嗜”，偏偏又“不能信”，这显然构成了他的“最大之烦闷”的焦点。在叔本华的误导之下，王国维似乎读懂了康德，却没有真正读懂。

王国维于1907年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三十自序》两篇，其二有言：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如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这里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说流传甚广，通常被视为妙悟，偶尔有人觉察到其中似乎有些问题，又不明所以。

至于“可爱者”和“可信者”之所指，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按照一种通行的方式，把近代欧洲哲学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流派，那么，在王国维看来，经验论是“可信者”，唯理论是“可爱者”。

对于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这很好理解。原本以为人是神（上帝或女娲）造的，达尔文却说是从猿猴变来的；原本以为是太阳绕着地球（也就是绕着人）转，哥白尼却说恰恰相反。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倡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与中国传统讲文化有冲突。王国维译介近代科学、教育学、心理学，让人见识世界，却在不同程度上使人感觉不适，大抵可以归入“可信者不可爱”之列。

“可信者不可爱”，至少还有“可信”的基石。“可爱者不可信”，着实让人寝食难安。对于唯理论，王国维“觉其可爱”，甚至于“酷嗜”，偏偏又“不能信”，这显然构成了他的“最大之烦闷”的焦点。然而，正如王国维在这段话中，交换了“不可信”和“不能信”——前者偏于对方，后者偏于自身——这就提示我们去探究，究竟是唯理论“不可信”，还是王国维自身“不能信”？

在王国维的阅读范围内，哲学上的“可爱者”即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康德。虽然康德有意把唯理论和经验论、把“可爱者”和“可信者”结合起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偏于唯理论，被王国维归为“可爱者不可信”之列。“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正是对应于康德三大批判，而在王国维看来，它们的可信度，不如实证论、快乐论、经验论。

王国维《三十自序》说他读康德的经历如此：

……次年始读汗德（按：此为“康德”日语译音）之《纯粹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艰其读。（按：于是转而读叔本华）……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学术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粹批判》外，兼及其他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

这段话说得颇为自信。而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以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附录《康德哲学批

判》为“通汗德哲学关键”。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叔本华在《康德哲学批判》里说了什么？

众所周知，叔本华早年服膺康德，他房间里摆着两尊头像：一尊是佛陀，一尊是康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叔本华思想成熟后最重要的著作，作为此书附录的《康德哲学批判》可以被视为其判教之作。它的开头有大段弯绕的话，其中有几句较为醒豁：

我的思想路线尽管在内容上是如此不同于康德的，却显然是彻底在康德思想路线的影响之下，是必然以之为前提，由此而出发之……在这个附录中我必须对康德采取彻底反驳的态度，并且是严肃地，不遗余力地进行反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即是说黏附在康德学说上的谬误得以剔除，而这学说的真理得以更加彰明，更巩固地发扬光大。（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95，567—568页）

这几句表明了叔本华的基本态度：他要开辟自己的思想路线，要把别人（主要包含但不限于康德）的水流引到自己的河道中来。

叔本华对于康德哲学作出判定如下：

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和自在之物间的区别……从此现象和自在之物间的区别就获得了一种绝大的意义和更深远得多的旨趣。（同上，569页）

对于整个世界的梦境般的这种本性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虑周详的论述，这本是康德全部哲学的基础，是康德哲学的灵魂和最大最大的贡献。康德所以能达成这一点，是由于他以可敬的清醒头脑和技巧拆散了，逐一指除了我们认识能力的全部机括，而客观世界的幻象就是凭借这些机括而成立的。（同上，572页）

一方面，对客观世界，康德区分了现象和物自体；另一方面，对主观世界，划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边界。叔本华对此作了准确的概括，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夹带了一些私货：“一种绝大的意义和更深远得多的旨趣”语焉不详，留下了回旋余地；而“整个世界的梦境般的这种本性”“客观世界的幻象”与其说是康德的，不如说是佛陀的，更是叔本华自己的观点，因为康德在承认物自体不可知的同时，还是要努力达到类似于阿波罗式的理性、清晰、光明的认识，绝不会把客观世界视为“梦境”和“幻象”。

更大的问题在于，上述两个方面诚然是康德哲学的重大贡献，但是，算不算“最大”“最大最大”，大可商榷。

如前所述，康德有意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而又偏向于后者。《纯粹理性批判》说得很明白：

人类理性不是从概念开始的，而是从普通经验开始的，所以是以某种实存之物为基础的。但如果这个基础不是立足于绝对必然之物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上，它就会沉陷。（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466页）

前一句肯定了普通经验和实存之物构成人类理性和认识能力的基础，但是后一句又进一步把“绝对必然之物”视为基础的基础。经验论者一定会拒绝接受“这块不可动摇的磐



▲ 康德纪念像章



▲ 王国维书法成扇（局部）

石”，除非康德能让他们在普通经验上加以确认。而在这一点上，如《三十自序》所言，王国维倾向于同意经验论者。

按照同样的逻辑，王国维恐怕也难以接受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三个理念，或者说三个预设：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有着科学主义倾向的王国维只能深深叹息，“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而在康德看来，即便这三个理念无法得到经验性的验证，也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人类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不得不作出的假设。康德并未要求别人对这三个理念信以为真。康德并没有在这里增加新的实体，它们“不超出经验之外去假定某个新的客体”，只是为了“在经验中的运用”，并且使之“接近完备”，最终达到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王国维曾称赞美孔子，说孔子从未对“仁”作出明确的定义，而是随机应变，运用于教育各个不同材质性的弟子，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那么，他又为什么不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康德呢？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里面有一句容易引起误解的格言：“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或译“扬弃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很多人据此以为，康德对宗教信仰作出了妥协。在《判断力批判》中，有很多地方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于无神论者、经验论者而言，这就是“不可信”。

好在，读到《判断力批判》第40节，我们看到康德重申了几年前在《何为启蒙》里的基本立场：

对被动的理性、因而对理性的他律的偏好就叫作成见；而一切成见中最大的成见是，把自然界想象为不服从知性通过自己的本质规律为其奠定基础的那些规则的，这就是迷信。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136页）



▲ 王国维书法成扇（局部）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从苏格拉底以来，就有一种传统的见解：人类不可能认识外部世界，因为自然界是神（或者上帝）创造的。按照维科的说法，人只能认识人所创造的东西。而康德在这里指出：自然界遵循“知性通过自己本质规律为其奠定基础的那些规则”。这种“知性”是人类的知性。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说明康德为其“腾出位置”的信仰，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理性的信仰”（余明锋《今天如何打开康德的遗产》，《文汇报·学人》2024年4月21日）。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叔本华对康德的判定有误。前面所说的那两个方面当然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但是他的“最大”“最大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其先验论和认识论，而是在于理性的目的论。虽然“按照近代所谓科学理性的标准，终极目的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科学的位置，因而也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康德认为他的时代理性与人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理性危机的出路在目的论。目的论是理性批判的最终归宿”。（张汝伦《康德二百年祭》，《读书》2004年第8期）在叔本华的误导之下，王国维似乎读懂了康德，却没有真正读懂——顺便说一句，他也没有读懂尼采。在《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他说尼采之学“皆本于叔氏”，两者“所趋虽殊，而性质则一”，大错——至少可以说，还不到三十岁的王国维对康德的理还不足够深入。他明明感觉到了康德哲学之“可爱”，奈何他却“不能信”。

毫无疑问，王国维对康德的误读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师地位。而对伟大思想家们的误读，一直以来就是对他们的阐释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布鲁姆所言，“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也许，本文也不例外。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汉学师承记》是清代吴派经学家江藩的名作，以传记体的形式综述清代前中期的“汉学”发展历程。经学史家周予同曾在1933年出版过一部《汉学师承记选注》（下称《选注》），置诸近现代不断推陈出新的《汉学师承记》研究论著中，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与更早问世的《经学历史注释》（1928）一样，《选注》也是周予同宏大的经学史著述计划的组成部分。《选注》凡例明确说：“本书原拟依拙著《经学历史注释》计划，不加删节，使成完璧……”，表明二者是一脉相承之作。细检内容可知，前书有相当多的材料都被采择到了后书之中。此外，二书撰写时间的衔接相当紧密。周予同在1927年末致信旅居广州的顾颉刚，说道：“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言惠士奇曾配祀于广州三贤祠。该祠在何处？今尚存在否？所谓三贤系何人？可为一查否？”（《与顾颉刚书》）三贤祠无关宏旨，周氏之所以有此数问，应当就是在为注释江藩做资料储备。

关于《选注》撰写的具体时间，周氏好友王伯祥留下了一些重要记录。王氏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所藏校经山房刻本《汉学师承记》书衣有题记说：“睹书涵芬楼时，同事友人周子同假去参校，辛壬难后见归，并附以识语，深致叹恨于寇祸。”周氏识语署1932年8月，其中说：“十九年（1930），为商编注江藩《汉学师承记》。承伯祥兄惠借校经山房单行本，以与各本校雠。”（《度稼谑记》）《选注》序言中，位于所列各单行本之首的校经山房光緒重刻本，应当就是王氏藏本。据此推知，周氏正式的校注工作应当集中开展于1930至1932年间。此时他承担的工作至少还包括主编《教育杂志》以及撰写《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等，加之时局动荡，参考书籍欠备，撰《选注》时的繁忙与艰辛不难想见。

作为《学生国学丛书》中的一种，《选注》的编选原则值得注意。按照丛书主编王云五的要求，体量较大的著作可删减篇目，但不可于一篇之中删去某段。（《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汉学师承记》原有正传40人，附传17人。周予同只选择20人，其余尽皆删去。他在吴派中选取三惠、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在皖派中选取江永、金榜、戴震、孔广森、凌廷堪，与吴皖二派都有交往的学者选卢文弼为代表，浙东学派则以邵晋涵为典型。再加上首卷的间若璩、胡渭、张尔岐、朱卷的黄宗羲、顾炎武，基本呈现了《选注》序言所概括的“黄宗羲一系演为浙东派”“顾炎武一系分为吴皖二派”的学术谱系。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长期从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周予同，不惟有连编例，常于一篇传记中删去天文、算学、乐律等过于专门的内容，以保持正文内容对初学者的适用性。

《选注》的大量校注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顾炎武传》引《论语》“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周予同在查阅《亭林文集》原文后指出，“我以”二字当作“学于”。可见校勘精细，一字不苟。再如《张尔岐传》过于简略，周氏特补充《碑传集》中的四篇张氏传记以供读者的参考。《戴震传》一系演为浙东派“顾炎武一系分为吴皖二派”的学术谱系。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长期从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周予同，不惟有连编例，常于一篇传记中删去天文、算学、乐律等过于专门的内容，以保持正文内容对初学者的适用性。

最能体现周予同非凡学术眼光与见识的一个问题，当是黄宗羲、顾炎武在江藩心中的真实地位。江藩将黄、顾二人置于末卷，并补记了一段“客问予答”。晚清以来，研究者多据“予答”立论，批判江氏拘泥于“汉学”门户者有之，斥责其见识卑陋、个性褊急者亦有之。周氏的意见可谓独树一帜。《选注》序言说：“顾、黄二氏不臣清室，则以义不当列于清儒。但‘汉学’家法源于二氏，又无木本水源的关系，所以于传后，故用主客观的体裁以明附录的命意。这可见江氏的苦衷，而同时可见当时文网的余威。”此处在重强调“汉学”渊源与政治忌讳，颇能表露出江藩隐

周予同与《汉学师承记》

赵四方

倘若留意“木本水源”四字出自“客问”而非“予答”，便知周氏已经认识到江藩的真正立场隐含在“客问”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藩对黄、顾的真实态度是“表抑而里扬”（《经学历史注释》），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多未深究此说，以致将江藩之意见完全读反了。近来陈鸿森重考此案，在博引众说、征诸历史后，认为唯有《选注》中的见解“稍觉近实”（《江藩〈汉学师承记〉纂著史实考》）。在20世纪的清学史研究领域，周氏这一洞察江著隐微的说法堪称弥足珍贵。

通过《选注》的撰写，周予同极大地扩充了自身的清学知识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自身清学史研究的基调。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问世后，学界多有重视经史的倾向，但周氏始终对吴皖是乾嘉“汉学”并驾齐驱的两支。他强调“吴派在搞史料上是重要的”（《中国经学史讲义》），这里的“史料”主要指历史上的各类经说，而这也正是周氏本人最关注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予同的学术气质更接近吴派（参《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与此相应的是，在晚清今文学的研究上，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常州学派扬今抑古的复古解放思潮，而周予同最关注的则是今文学经说体系的再现。周氏笔下的“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经今古文学》），自是有为而发之论。

对清学史的关注一直持续至周予同的晚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长期用作大学文科教材，下册部分（唐代以后）出自清代的篇目反复占去半壁江山。他不仅在课堂上下反复强调《论衡·清儒》的重要性，还计划开展“清代学者对于古史研究的贡献”“清经义考”等研究课题。晚年的周予同依然十分重视《汉学师承记》，将它列入清学史的参考资料之首。他遗憾于当初未能注释全本，希望弟子可以重新修订并补齐全书，可见一直挂怀于《选注》的修订与完善。

《选注》出版迄今已逾90年。作为《汉学师承记》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注本，该著诚然存在一些疏漏与讹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本校订、经说阐释、史源搜访、字词语释等方面皆具开先河之之功。近藤光男《汉学师承记译注》与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对之都有大量吸收与借鉴。周予同善于将经学史研究与经典注疏、历史教育相结合，而《选注》恰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正是因此，对该著进行检视与剖析，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周予同的学术履迹与思想。（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387号、389号的是一处典型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鹅黄色外墙，假三层，红色半露木构架，窗框有红砖镶边。这处房屋原为比利时商人鲁义士（M. Albert C. Loonis）洋行住宅，于1932年设计建造，由中国营业公司施工，后来几经转手，曾作为荣氏家族成员、实业家荣智勋的住宅。1999年9月23日，此处被定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

关于房屋最初的主人鲁义士，相关介绍不多，大多知道他原先是中国营业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后来自己创建洋行，专做中高端房产租赁买卖，管理过爱林登公寓（即常德公寓）。通过检索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等文献，笔者尝试更清晰地梳理鲁义士在上海的创业发展历史。

在研究上海史的重要编年资料《行名录》中，鲁义士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17年1月。他名列法租界公董局地籍处，职位为办公室主任。而后，在1917年7月至1921年7月的多份《行名录》上，名列土地办公室之下，且从1917年7月至1919年1月，注明为首席调查员。

1920年5月31日，事业稳定的鲁义士先生迎来了婚姻大事。《北华捷报》上刊登了鲁义士先生和Eveleigh小姐盛大婚礼的报道：

法租界公董局工程部门的M. Albert C. Loonis先生与Arthur Eveleigh先生和夫人的女儿Shura Eveleigh小姐的婚礼于周六举行。上午在比利时领事馆举行世俗婚礼仪式，由总领事D. Siffert先生主持。下午3点在圣约瑟夫教堂举行宗教婚礼，由Crochet S.J.神父主持。教堂装饰得非常漂亮。……婚礼后，在位于宝建路(Route Pottier, 今宝庆路)22号的新娘父母家举行招待晚宴。

鲁义士的职业在该报道开篇就点出，他就职于法租界公董局工程部门。这个职业身份对他而言相当重要，与他后来在上海的发展息息相关。主持婚礼的D.Siffert即薛福德，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起担任过较长时期的比利时驻沪领事。1912年4月18日，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宴会作为“中外人士会晤之所”的高贵宴会举行，宴会就是由薛福德主持的。鲁义士的婚礼邀请他来

主持，男方家族在当时上海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

再来看看女方家庭，可以从她的父亲Arthur Eveleigh入手。据1916年《行名录》，Eveleigh是位于广东路10号的洋行Eveleigh & Co.的负责人。1918年9月5日的《大陆报》报道：Eveleigh已被任命为尤罗维塔内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又据《字林西报》《行名录》等资料，Eveleigh后又供职于祥茂洋行、达孚洋行，并且在洋行任职之外还担任三一俱乐部主席、上海洋商纸业公会副主席以及上海棉花洋公会主席。据《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资料，1940年7月起，Eveleigh从各个协会和组织陆续退休。

Eveleigh不仅在中国营业公司工作期间，且乐善好施。《字林西报》上屡有感谢Eveleigh夫妇捐赠的讯息，比如女子教会司库感谢Eveleigh夫妇为纪念威廉·布朗先生捐赠5美元，慈善联盟财

务感谢Eveleigh夫妇和其他几位为纪念罗伯特夫人捐赠10美元。以上种种可见，新娘也来自殷实的家庭。

据《行名录》记载，1923年1月起，鲁义士担任驻华比利时商会秘书，至1925年1月止。1926年1月起，鲁义士的名字已经列在中国营业公司下，也就是说，他此时已经处于后来最为人们熟悉的一段职业生涯中。该洋行经营范围包括金融、保险、土地和房产代理、建筑师和测量师等。在主官一栏，鲁义士列第三，为秘书，排在总裁、副总裁兼财务之后。至1932年7月，鲁义士已晋升为副总裁。在1937到1939年的记载中，她始终位列管理层。本文讨论的永嘉路的住宅就是他在上海营业公司任职期间建造的。

鲁义士在中国营业公司工作期间还担任“地产估价员”，这一身份在《市政公报》上得到佐证。1930年该报总公布3份公共租界的地产估价表，分

别是：1930年9月5日的中区地产估价表、9月26日的北区地产估价表和11月14日的东区地产估价表。这几份地产估价表体量庞大，最后的签署者都包括了A. Loonis（鲁义士）、Wm.E. Sauer（洋行总裁）和R.E. Scatchard三人，他们的身份均为“土地评估者”。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刊登中文版地产估价表，末尾显示，“一九三〇年地产估价员：路尼(A. Loonis)、少欧(W.E. Sauer)、斯基盖(R.E. Scatchard)”，这与英文表格中的三位签署者是一一对应的。

据《大陆报》，1938年3月，鲁义士在法国公董局地产委员会选举中被选为“外国入董袖”，可见其事业发展之隆盛。在中国营业公司任职多年后，鲁义士自行创业。在1939年《行名录》中可查到他名字命名的洋行，即Loonis & Co., A.,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和保险，地址为九江路113号大陆银行大楼共公布3份公共租界的地产估价表，分

永嘉路鲁义士住宅背后的故事

罗婧

读城

录》中可查的记录仅存至1941年。这一年的相关记录有：爱林登公寓，功能为住宅公寓，在赫德路195号，管理办公室为鲁义士洋行。

鲁义士除本职工作还参加了很多社会组织，据《行名录》记载，1932年起担任比利时福利协会副主席，1933年7月升任主席。又据1935年上海中法友谊会编《留比学生名录》，他是中国比利时友好协会比方11位代表之一。1937年在上海国际救济会会员录中，鲁义士也在列。但这次中文译名与前面出现不同，译为“龙里史”。

鲁义士热爱旅游，报上多次报道他陪同家人度假。据《北华捷报》，1931年8月鲁义士夫妇乘“亚洲女皇”号前往比利时度假；1934年11月，鲁义士夫妇、女儿和另外几对夫妇乘坐日本特快游轮。1938年9月，鲁义士夫妇又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从马尼拉乘坐游轮回到上海。当然，报纸上也有一些关于鲁义士官的报道、登报致歉声明等，诸如此类，为我们勾勒了更立体的人物形象。

行文至此，一个勤勉工作、热心慈善、热爱生活的房子主人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也许正是个性使然，鲁义士才会选择自然舒适的英式乡村花园风格作为自己住宅的风格吧。（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